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少数民族变迁丛书



◎主编：何明

藏彝走廊西部边缘

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ZANGYIZOULANGXIBUBIANYUANMINZUGUANXIYUMINZUWENHUABIANQIANYANJIU

◎高志英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少数民族变迁丛书

何 明◎主编

藏彝走廊西部边缘 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高志英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何明主编;
高志英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3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少数民族变迁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0664 - 6

I. 藏… II. 高… III. ①藏族—民族关系—彝族—研究—
西南地区 ②藏族—民族文化—研究—西南地区 ③彝族—
民族文化—研究—西南地区 IV. K281.4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2523 号

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钟美珠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pbs.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21 千字

印 张: 12.5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664 - 6/K · 1904 (汉 104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一

作为民族历史—地理概念，“藏彝走廊”是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经过多年对以往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之后提出来的。该研究著述所涉区域处于费孝通所指“藏彝走廊”的中南段，其地理行政区域在当下属滇西北三州一市地区。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该区域除了曾经受到以汉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外，还受到过以佛教文明为代表的南亚印度文明的间接影响，以及近代伴随西方殖民扩张的基督教文明的浸入。除了上述宏观历史背景之外，藏彝走廊上的该区域在元朝之前还曾经先后出现过系属不同地方族群集团建立的诸如南诏、大理的强大政权。在明朝还出现曾称雄地方而授封于中央王朝的丽江木氏土酋政权。同在明朝该区域还曾经是中央王朝和藏彝走廊西南吐蕃政权相互争夺的重要区域。该区域纷繁的历史过程以及地方族群间的冲撞交融，加上多元复杂的地理和生态环境，致使该地区长期以来经历着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相互纠缠交织的历史过程。虽然历史与现实都在显示民族和族群是动态的、与时因地变化的和不断被建构的，但我们过去的许多研究则多忽略对这些历史本相的探究。区域民族与族群间的互动，包括他们人口上的多数与少数、在地方政治上的中心与边缘以及经济和文化上的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5
前 言	11
Preface	15
第一章 序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1
一、选题缘起.....	1
二、主要研究内容.....	5
三、研究价值.....	9
第二节 研究回顾	11
一、纳西族研究概述	11
二、藏族、普米族研究概述	13
三、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勒墨人研究概述	14
第三节 研究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16
一、研究场域自然环境	16
二、研究场域社会环境	18
第二章 唐代“三强逐鹿”下的藏彝走廊西部各族	21
第一节 磨些蛮的迁徙与分布	21

第一章 序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一、选题缘起

本书研究场域为云南西北部，亦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藏彝走廊的西部。藏彝走廊自甘肃、青海向南延伸，沿着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南下，到了三江并流地区之后，呈现向南、向西的扇形展开状态。如果我们把这个扇柄地带视为藏彝走廊西部核心区，那么，澜沧江、怒江、独龙江流域就可以看成是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区。

费孝通先生在 1978 年首次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并在 1981 年和 1982 年有关民族问题的两次发言中完善之。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费老说：“上面所讲那个地带就是我说过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

走廊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① 笔者在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探讨藏彝走廊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变迁似乎是责无旁贷的任务。

藏彝走廊核心区域民族历史文化，尤其是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辈出，成果丰硕。笔者关注和研究此地带的民族关系及其文化变迁也有一段的时间了，但作为会说母语的纳西族学子，非如众多纳西同胞学者那样把视野主要放在纳西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是力图关注整个藏彝走廊西部地区，系统综合梳理其民族关系与历史文化变迁。这是笔者生活经历与学术背景相结合的一种理性选择。

1995年，笔者（1985年至1995年在怒江民族师范学校任教）重新回到昆明，投师中国少数民族史专家林超民博士、潘先林博士攻读少数民族史硕士学位；2001年，继续师从林超民博士攻读少数民族史专业（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博士学位；2006年，师从王铭铭博士做人类学博士后。从怒江到昆明，从昆明再到北京，差不多15年时间，有幸跟从两位历史学、人类学专家研习。这过程也是我不断摸索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如果说，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从历史学到民族学转变的自发过程，那么，到博士后阶段就是一个自觉的阶段了：只有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使藏彝走廊西部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系统化、深入化。

1995年丽江大地震及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在学术界掀起了“纳西文化热”、“丽江文化热”，又由于旅游经济的刺激，纳西族文化研究高潮迭起。特别是会说母语的纳西族青年学子中，似乎已把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定式

^①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或轨迹。而笔者“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取向，深受导师林超民博士与木芹教授的影响。林超民博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个民族史博士，他以自身经历主张“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他坚持研究方向选择要与个人志趣相结合，这给学生们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中给了更广阔的空间。历史学家木芹教授（纳西族）长期跟随方国瑜先生整理西南民族文献史料、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也如方国瑜先生不仅仅把学术视野盯在本民族历史文化领域内，而且也是对云南乃至西南民族历史文化都进行系统研究的实践者，跨民族研究开阔了他的学术胸襟。鉴于笔者会说纳西语、傈僳语，从小在怒江大峡谷长大，木芹前辈建议笔者从怒江、独龙江地区各族的历史文化着手，再逆向把澜沧江、金沙江整个滇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由此及彼、由点到面“连成片”进行研究。林超民教授鼓励笔者要有“板凳要做十年冷”的精神，因为比之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欣欣向荣，怒江地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研究要冷寂得多，从研究地的交通而言更要艰险得多，从生活条件而言要艰苦得多。

于是，笔者身负前辈的期望和鼓励，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都专心致力于怒江地区，亦即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从硕士学位论文《怒江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到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独龙族观念嬗变研究》，从独龙江到怒江、到澜沧江，一点一滴把前人没有涉足过的历史问题梳理清楚之后，感觉到了木芹前辈所说的把整个滇西北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由此及彼、由点到面，“连成片加以系统研究”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从中也体验到了林超民博士所说的“板凳要做十年冷”的真正含义。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困惑也越来越多。在对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区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的研究中，以历史学学科训练为基础的笔者，一直受到文献和考古史料缺乏问题

的困扰。这些民族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普米族文字韩归文（又写作“汉规文”、“汗归文”等）也仅仅在宗教中使用；汉族官员和学者历来罕至其地，汉文献记载不但稀少，而且因为文化偏见，不乏以讹传讹者。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何借用口碑资料或者说民族历史记忆来复原民族历史，成为笔者学术研究中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在系统研究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志趣的引导，以及研究中缺乏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笔者的羁绊，促使笔者在 40 岁的年龄，还北上北大投师王铭铭博士等人类学、社会学专家“取经”。选题缘由也是想经由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的指导，在对滇西北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弥补笔者学术理论的贫乏，改善学术能力的不足，更主要的是力求对藏彝走廊西部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现状作系统完整的梳理研究。

进入王铭铭教授门下之后，王老师不嫌学生基础薄弱、资质愚钝，悉心指导，力图使笔者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中搭起一座桥梁，以便得以实现系统、完整研究藏彝走廊西部民族关系及文化变迁的夙愿。在慷慨赠送了他撰写的所有专著，让笔者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有所领悟之后，为笔者确定了能够扬长避短的研究路径和方向，即在结合笔者多年研习历史学的基础上，根据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缺少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而传有大量的口传历史记忆资料的实情，针对以往对藏彝走廊西部研究中以民族或行政区域分割研究的缺陷，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整个藏彝走廊西部民族历史与文化变迁作历时性的梳理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王老师的指导，让笔者视野开阔、方向明确。

在学习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中，他对藏彝走廊的关注为笔者打开了一扇宽绰的学术之窗，历来在藏彝走廊西部民族研究中，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陆学科的调整和重新建构之后，大多关注民族研究的学者都聚焦于各自所研究的那个民族的历史文

化,各个地区学者研究各自地区的历史文化。因此,对于整个藏彝走廊西部众多民族之间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关系的研究,对于他们之间的分化交融的研究,就难以做到系统和全面。费老的“藏彝走廊”思想使笔者顿悟出,对于藏彝走廊西部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放在一个更久远的时间、更广阔的空间内进行。

王铭铭博士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提出了“三圈理论”,即内地汉族为一个研究圈,边疆少数民族为中间研究圈,国外民族为第三个研究圈。在这三个研究圈中,中间圈和第三个研究圈的力量尚薄弱,成果也尚少。笔者所关注的藏彝走廊西部地区兼有中间圈和第三圈的特征,历史上当作“化外之地”的滇、藏、缅交界地带的大片土地属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西南边疆的“中缅未定界”,藏彝走廊民族迁徙的西部终点大致也在此境。因此,对此地带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可以对应王铭铭博士对中间圈、第三研究圈的关注。结合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观念和导师王铭铭博士的三圈理论,如果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进一步结合当地的历史与现实场景进行分析和探讨,就有可能回归到木芹前辈所说的对滇西北藏彝走廊西部地区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由点到面“连成片研究”的寓意。

二、主要研究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藏彝走廊的讨论中,界定了其起点与终点,并指出了“在藏族与彝族之间的地区里”的民族分布特征。此后,学术界对“藏彝走廊”民族迁徙的大致方向是:“六江流域藏彝走廊上居住的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有着一部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①

^① 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中国西南古代交通与文化》,3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石硕认为：“‘藏彝走廊’的范围显然主要应框定在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因为正是这一区域呈现了典型的東西形成屏障的南北线性通道。”^① 李星星在《论“藏彝走廊”》中也说：“‘藏彝走廊’依山川走向形成若干自然通道。”^② 将此区域的地理与人文相结合，主张藏彝走廊民族的“从北向南迁徙”。但是，且不论藏彝走廊其他部分民族迁徙走向是否如此单一，单就本研究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藏彝走廊西部地区呈现扇形展开之后，民族迁徙的方向究竟如何，在其中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却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探讨。

由于对藏彝走廊地区的长期关注，翁乃群教授“在调查中切身感受到以前孤立的以一个个民族为单位的研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指出：“正是在几千年的族群迁徙流动中，这一区域变成了现今一个具有极为丰富的、进行多学科田野研究和理论对话的不可多得的巨大平台。”^③ 在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中，也应当注意从多学科结合的角度进行探索，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试图跨区域、跨民族、跨学科来研究藏彝走廊西部地区民族关系与文化变迁的原因、背景、过程及趋势，以求深化对藏彝走廊的认识，在相关学术问题上提出个人的一孔之见。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主要由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① 石硕：《“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见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②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

③ 翁乃群：《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学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

第一个内容，主要研究8世纪前后唐王朝、南诏、吐蕃在藏彝走廊西部核心地带“三强逐鹿”，先是磨些蛮创立的越析诏在南诏与唐朝合力下被击溃，磨些蛮被迫举族迁居铁桥上下；接着聚居于洱海之北的“乌蛮别种”中的施蛮、顺蛮所创立的“北三诏”被南诏吞并，其部族迁往铁桥上下金沙江流域，与磨些蛮、长浑蛮、汉裳蛮、吐蕃、罗罗等杂处，形成了藏彝走廊西部民族分布的初步格局。

第二个内容，主要研究“元跨革囊”之后，丽江路蛮有八种，即磨些、白、罗落、冬闷、峨昌、撬、吐蕃、卢。他们“参错而居，故称一国”。其中磨些蛮以其居处藏彝走廊西部核心地带之地利，加之元军革囊渡江之后扶持迎降的磨些头人麦良被封官之天时，开始登上藏彝走廊西部历史舞台，形成了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雏形。元代丽江路西境远达今天高黎贡山独龙江流域，这也是中国在云南西北部地区的最西疆界。丽江路境内有撬蛮、卢蛮和吐蕃杂居，藏彝走廊民族分布区域扩大。元代磨些贵族势力的崛起，使藏彝走廊西部地区“酋寨星列，不相统摄”局面得以结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标志着中央王朝势力在藏彝走廊西部地区的深入。

第三个内容，研究由于明代木氏土司寢强，屡次被明朝封官赏赐，木氏土司也以“世尽臣职”之心不遗余力抗击吐蕃南下。木氏土司在战争中所立赫赫军功的背后，就是境内众多民族被卷裹到战争漩涡之中。从元代“卢蛮”中分化出来的栗粟以不堪忍受战争之苦，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流域，使原来居住于此境的“卢蛮”被其所统治；在南诏统一战争后迁徙到南诏辖区西部澜沧江流域的白蛮支系那马拉马、拉玛和勒墨，也同样被栗粟所奴役。怒江中游一带则有文理云龙段氏白族土司势力深入，由此汉文化在此境广为传播。麽些（磨些）和吐蕃相杂居，出现了“藏纳”和“纳西古宗”两个兼有麽些和吐蕃文化特征的人群。

体。元代进入藏彝走廊西部的西番也同时兼受纳西文化和藏文化的影响,“藏化”和“纳西化”趋势明显。

第四个内容,研究清代木氏土司势力衰微,其西境维西纳西土司崛起,其中叶枝土司势力远达怒江北部及独龙江流域。维西地傈僳族恒乍绷起义失败后,傈僳族再次向西迁移到怒江流域,成为此境主体民族,与元代就居住于怒江流域的“卢蛮”分化成两个民族共同体,并使怒族、独龙族、拉马人、勒墨人出现了“傈僳化”趋势。不堪忍受栗粟欺凌的贡山怒族、独龙族远赴维西厅纳贡求附,自此贡山北部与独龙江地区直接纳入维西厅统治之下,加强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叶枝土司禾娘为给早逝的丈夫和儿子超度,把怒江北部以及独龙江流域转赠给察瓦龙喇嘛寺和土司作为超度费,独龙族和贡山怒族就处于异族土司、头人和喇嘛寺势力的层层欺压和盘剥之下,远赴维西厅请求纳贡归附。天主教传播到藏彝走廊西部地区,引起与信仰藏传佛教僧俗的冲突而导致教案此起彼伏。英帝国主义则盘踞其殖民地缅甸对此境虎视眈眈,频频“探险”、“考察”。汉文化的长期浸润与帝国主义侵略所导致的边疆危机相互交织,激发了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各族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第五个内容,研究民国时期藏彝走廊西部边缘边疆危机加剧:一是英帝国主义占领独龙江中下游地区;二是英军、日军侵占片马;三是基督教在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中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加强了对此境的管理,派遣殖边队进驻怒江,其后怒江各县设立设治局,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也空前增强。这一时期此境的民族文化变迁:一是因为被称作“客籍户”的汉族、纳西族、白族商人、官员的进入而出现“汉化”趋势;二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而出现“基督教化”趋势。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各族的“基督教化”是历史上各族“傈僳化”特征的延续。

第六个内容,主要在探讨藏彝走廊西部民族的迁徙伴随其整

个民族发展历史，民族间的分化与交融也一直不断，其原因归结起来有3个方面：战争、经济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同源异流民族的分化与交融：一是具有历时性特征，即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分化与民族交融各具特色；二是具有共时性差异，即同一历史时期，各区域内的民族分化与交融各不相同，导致处于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的文化出现多样性。在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各区域内先后出现的“纳西化”、“藏化”、“傈僳化”、“汉化”、“基督教化”的文化变迁特征，最终以“汉化”成为发展变迁的主流。而中缅边境福贡、碧江、^① 泸水、贡山的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中，则呈现“汉化”与“基督教化”并存之趋势。

三、研究价值

滇西北民族研究是中国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从民族而言，重点在对纳西族与藏族的研究，而对其他民族关注较少；就研究地域而言，主要集中在丽江及迪庆，即金沙江流域铁桥上下之地，而对怒江、独龙江地区涉及不多；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多学科交叉研究则不多。

其一，有必要在学术视野的系统性、完整性以及多学科结合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特别是鉴于藏彝走廊氏羌系统民族历史上同源异流，又同处于一个空间，在不同地理单元之内分化成不同民族。从政治关系而言，自从元代以来一直受丽江木氏土司管辖；从文化而言，具有汉文化圈、藏文化圈、纳西文化圈、傈僳文化圈等文化圈相互重合，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特征。因此，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地缘亲近，关系密切，文

^① 1986年碧江撤销县制，原所属乡镇分别归属福贡县、泸水县。

化融汇，如果孤立地研究某一区域、某一民族显然是不系统、不全面的，对其进行“连片”研究，乃是目前或下阶段藏彝走廊西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之佳径。本项研究的完成，有望为“藏彝走廊”西部地区的“连片”研究填补学术空白。

其二，本项研究在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既看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历时性特征，同时关注同一区域内同源异流民族之间的共时性的差异所在；既注意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同时注意口传资料的搜集与甄别，是一次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学术实践，可以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实证案例。

其三，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的分化、形成，因其地域特征、多民族杂居特征而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历代，尤其是唐代和明代中央王朝与吐蕃势力长期抗衡，境内各族因民族战争而长期迁徙，多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过程，也是汉文化“大传统”与边地少数民族“小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不断浸润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之内呈现“藏化”、“纳西化”、“傈僳化”和“基督教化”的趋势，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两条发展主线相互交织局面长期延续，最终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汉化”成为藏彝走廊西部民族文化变迁的主流。本书的完成，在于探讨民族战争、民族迁徙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在民族分化与交融中的作用，也探讨国家力量、“大一统”思想在民族分化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试图思考中华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形成之历史线索及现实意义。使本研究具有藏彝走廊西部地区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环境中探讨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典型性意义，也具有以此个案思考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普遍意义。

其四，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地区地处中缅边境，藏彝走廊的迁

徙脚步从唐代就延续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多民族、多跨界民族、多宗教类别，民族关系复杂。本报告也研究藏彝走廊西部及其边缘多民族和睦共处、多宗教和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状，可以为政府处理边疆地区民族关系、民族宗教问题提供参考决策的依据。

总之，笔者在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民族历史与关系的研究引向学者关注较少、研究成果尚少的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将综合实践王铭铭博士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三圈理论”，特别是将边疆少数民族研究圈和国外民族研究圈加以综合研究。而且对藏彝走廊西部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开启和探索以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用之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回顾

对于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历史文化之研究，从区域而言，历来有核心地带热和边缘地带冷的特点；从民族而言，有纳西族、藏族研究热和普米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勒墨人（白族支系）、拉马人（白族支系）研究冷的特点；从研究方法而言，早期有历史学研究热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冷的特点，近年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热和历史学研究冷，或者彼此各自为阵的特点。

鉴于篇幅所限，而研究民族众多、涉及地域广、前期研究成果多寡不一的特点，分民族摘要概述之。

一、纳西族研究概述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就掀起了第一次纳西族研究高

潮，陶云逵的《关于磨些之名称分布及迁移》、《磨些族之羊骨卜及骨卜》以及方国瑜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等被视为始发轫者，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抗战时期，汉族学者如李霖灿等对纳西文化的研究，引起外界对纳西文化的关注；国外学者洛克所著《中国西南边疆纳西族的生活与文化》及顾彼得所著《被遗忘的纳西古王国》，把纳西文化推向了世界。

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方国瑜为首，其门下先后有和志武、木芹、傅于尧等一批纳西族学者研究纳西族的历史与文化，他们以整理史料，包括以整理东巴文献资料为主要贡献，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夯实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以郭大烈为首的一批纳西族学者，另外还有和种华、白庚胜、余嘉华、杨福泉、和少英等。其中以郭大烈与和志武合作的《纳西族史》为首要，是对以前纳西族研究的一个总结，并把纳西学研究推向深入。其余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纳西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如杨福泉的《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及余嘉华的《木氏土司与丽江》等，对纳西族的历史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20世纪末期，纳西族学者中的新生代涌现出来，如木仕华、周智生、高志英等一批纳西族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博士。他们的探索，为纳西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力量、新的学术成果，如木仕华主编的《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周智生博士论文《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以及高志英有关藏彝走廊西部民族关系与历史文化变迁的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多维视野来研究纳西族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及其文化交融与文化变迁。这一时期非纳西学者加入纳西学研究的也越来越多，如甘雪春博士论文《正在走向世界的纳西学》，对国外的纳西族研究作了系统的梳理。